

苏维埃中央革命博物馆的建立和开放

徐佳佳



中央苏区的文体活动现场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就开始尝试建立保管、陈列各类革命文物的博物馆。其中,由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筹建,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召开期间对外开放的中央革命博物馆就是其中规模较大、级别最高的博物馆。它的建立和开放,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以及提高和改善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初心。

创办苏维埃中央革命博物馆构想的提出

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第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提出,要“编纂红军战史及死难同志传略,并收集其遗物作纪念品”。虽然限于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这一决议案还未能考虑到建立革命博物馆来陈列和保存这些革命文物,但是收集、整理革命人物的相关文献资料、实物等设想已经开始萌生。

随着各地各级苏区政权陆续建立及各项苏区建设工作的开展,文博工作也被提上各地苏区政府的议事日程。1930年8月,在中共闽西特委的指导下,闽西苏区政府及其下属各县苏区政府就希望筹建革命纪念馆或博物馆,借以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进而做好党政宣传教育工作。这些尝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新建的一些纪念馆或博物馆普遍规模不大,尤其是陈列品较少,因此参观的群众不多,影响也较为有限。

苏区博物馆建设工作乃至文博工作取得较大进展,还是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召开期间,大会筹备委员会就举办过红军战利品展览。这次展览虽然陈列品不多,但在苏区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于是便启发了中央苏区政府建立中央革命文物博物馆的构想。

在苏区各项建设事业全面开展后,作为承担中央苏区文化工作的主要部门,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在成立之后召开的第一次文化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做好苏区革命遗迹在内的各类文物的征集、保管等工作”。该会议结束之后,各省、县、乡苏区政府教育部门也纷纷召开了各地的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并根据上级会议指示精神着手开展了本级革命遗迹的收集工作。

1932年5月,《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教育工作决议》发布,要求“各地方遇有新旧书籍、

标本仪器、古物及革命的遗迹,应由当地政府投送省文化部处理与保管”;1932年9月,“闽浙赣省苏”也发布了的《第二次闽浙赣省苏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提出:“搜集斗争中的纪念品,及为革命牺牲的红色战士的可留为纪念的物品,一切革命烈士的纪念品等等,建立革命纪念馆,使群众参观,兴奋群众革命的斗争情绪。”当年冬天,苏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还与中央土地部筹办了中央农产品展览,展出了200多件农产品,为苏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建设革命博物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除了各级苏区文教部门,革命互济会等群团组织也参与了革命纪念馆或博物馆的筹备工作。其中,1933年4月14日,中央苏区革命互济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为建立革命博物馆及纪念黄公略、赵博生纪念碑决议案》,不仅明确赞成中央苏区创办中央革命博物馆的建议,并要求互济会配合各级苏区政府做好相关筹备工作。

各项准备工作成熟后,为加快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建工作的步伐,1933年5月,苏区中央政府设立了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并将其设置在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内,由该部的工作人员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之后为了让中央革命博物馆的管理工作常态化,又将其划入教育人民委员会社会教育局,由该局直接负责其建成之后的日常管理工作。

1933年6月,中央苏区执行委员会第27次会议作出召开“二苏大”会的决议,随后,“兴建一批建筑工程迎接二苏大的召开”也成为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一项重点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代表苏区文化建设成果的中央革命博物馆就被“二苏大”的筹备委员会纳入大会的筹备项目之一,与红军烈士纪念馆、红军烈士纪念馆、红军检阅台、公略罗、博生堡、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等工程一起作为“二苏大”的献礼工程。而这

决定也让中央革命博物馆的筹建工作迅速有序开展起来。

革命文物征集工作的开展

要把中央革命博物馆建设落到实处,还需要解决两件大事:一是场馆搭建,二是革命文物的征集。能够拥有一个较大的场馆固然好,但当时的苏区环境十分恶劣,不仅经常面临战争威胁,经费也比较紧缺,因此苏维埃中央革命博物馆的筹建负责人决定不再新建专门的场馆,而是将现成空置的寺院、庙堂、办公室等进行改造,用于陈列革命文物。

在解决场馆问题之后,中央革命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就主要落在了陈列品的征集方面。1933年5月25日,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在各法律文件的基础上,由代部长徐特立签发了《中央革命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启事》,并刊登在6月29日的《红色中华》上。该启事一方面说明了中央教育部成立革命博物馆的目的,即促进苏区文化教育,还告知了社会各界革命博物馆将暂时建在中央苏区政府所在地的计划;另一方面还重点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始请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及个人,帮助搜集下列各种物品,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具体包括三大类:一是“革命文件(1933年以前的),包括标语(贴在壁上的标语,或标语稿本);各种决议案、指示信、报告;传单画报、杂志、报纸及政治简报;革命的印刷品或抄本;统计图表等”;二是“反动的文件(敌人进攻的计划书、反动传单、反革命政治派别和各种文件等)”;三是“私人的物品”,包括“革命领袖的、烈士的、反革命领袖的”。

此后,为了扩大革命文物的征集范围,时任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秘书长、社会教育局局长阮山在1934年1月13日的《红色中华》上又发表了《教育人民委员会献给二苏大会的礼物

——筹备中央革命博物馆》一文。文中将待征集的革命文物分为10类,包括:世界革命领袖照片及其事迹;中国土地革命历史的变迁;中华全国苏区发展形势图;牺牲烈士的遗像及其光荣事迹;牺牲烈士纪念品;红军和地方武装胜利品;机关部队革命团体的纪念品;红军机关和地方武装所发明的与自制的军用品;苏区各地的特产品;苏维埃文化。这些革命文物的10个分类与之后中央革命博物馆的展厅布置基本一致。

中央革命博物馆隆重开工

1934年1月,“二苏大”会在瑞金隆重召开。大会召开期间,中央革命博物馆也与其他献礼工程一同正式对外开放。中央革命博物馆的主场馆位于瑞金东郊的一座旧祠堂。这里除了新建的中央革命博物馆,还有中央苏区土地部下属的农事试验场和农产品展览馆。这些展览馆集聚在一起,有利于群众集中参观。除此之外,中央革命博物馆在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办公大楼内部还设有一个主展厅。这个主展厅是一间大厢房,与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社会教育局办公室毗邻,距离“二苏大”会的大礼堂只有一里路。

“二苏大”会召开期间,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不仅与“二苏大”会的会务组一起安排了“二苏大”会外地代表专门前往参观,还呼吁在瑞金的苏区苏区机关、群众团体、红军组织集体参观,并邀请居住在附近的群众积极参观。中央革命博物馆的主展厅虽然不大,但是展出的革命文物与苏区发展建设密切相关,备受各界群众喜爱。同时,中央革命博物馆还免费对外开放,是一所完全公益的文化机构,对苏区红色文化的普及与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岳寨阻击战,八路军大破日伪“新战术”

贾晓明

编后拾遗
BIANHOU SHIYI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八路军开辟了湖南抗日根据地,位于苏鲁豫皖四省接合部,因其大部分位于山东省南阳、独山、昭阳、徽山等南四湖以西而得名。早在1921年底,湖西地区就有共产党员在播撒革命火种。由于该地区地理位置特殊,战略地位重要,湖西地区成为敌、伪、顽与八路军反复激烈争夺的地区,斗争显得尤其残酷复杂。

1941年后,日军多次集结重兵对湖西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活跃在这一地区的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战略部署,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多次粉碎了日伪的“扫荡”,攻克了日伪多处据点,为保卫、巩固湖西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2年上半年,日伪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对湖西抗日根据地发起“大扫荡”。4月14日夜,单县、碭山、虞城三县日伪军3000多人,分乘汽车百余辆,兵分三路向驻守在单县黄颡、朱破楼地区的十团进行“铁壁合围”。此次“扫荡”敌人总结了多次失败的教训,在夜间“长途奔袭、秘密包围”,于第二天天亮后向八路军发起“多路合击”的新战术,企图“一举消灭十团”。

对此,湖西抗日根据地设立的情报站在日伪军出动前就获得准确情报,并通知了十团。得到情报后,为保存力量,十团决定派三营十一连在岳寨大堤阻击敌人,掩护团主力和干部群众撤退。

十一连指战员接到命令后,立即向岳寨跑步前进,于15日拂晓前迅速抢占了大堤制高点,并抓紧时间,加固了阵地。早7时,敌人的先头部队出现在北大堤西岳寨东北堤口。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立即猛烈射击,很快击毁了

前面4辆军车。日军被击毙20余人。一阵慌乱后,日军六七十人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向十一连阵地冲来。战士们利用大堤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敌人开火,很快打退了敌人的这次进攻。

击退敌人第一次进攻后,十一连各排立即检查武器弹药,准备再战。8时左右,敌人发起了第二次进攻。十一连指战员早已严阵以待,他们隐藏在工事里,在敌人冲到距离大堤50至30米时突然开火。激战近半小时,敌人被击毙30多人,残部不支,纷纷向后溃退,十一连以火力追击又杀伤了一些日军。

9时左右,敌人在援军到来后,发起了第三次进攻。日军指挥官首先用一个中队的兵力向正面阵地进攻,同时派伪军一个中队在日军的配合下向十一连侧后发起包抄,企图以“兵分两路、前后夹击”的战术攻破十一连的阵地。两股敌人均遭到十一连的迎头痛击。激战中,三排一个班突然冲下大堤,向伪军发起反攻,首先将伪军击溃,又经过1

个多小时的激战,第三次成功地击退了正面阵地前的日军。

敌人不甘心失败,调来3辆装甲车,发起了第四次攻击。二排四班长刘玉田在机枪火力掩护下,敏捷地冲下大堤,绕到装甲车侧翼,将预先准备好的集束手榴弹投向装甲车轮子,炸毁了敌人的第一辆装甲车。敌人改变战术,让第二辆、第三辆装甲车“互相掩护,交替前进”。十一连爆破组果敢出击,接连将两辆装甲车炸毁。敌人的第四次进攻又告失败。

12时,十一连得到团主力和干部群众安全转移的消息后,决定分散突围。为分散敌人注意力,一排首先从西北方向突围。战士们找到敌人炊事班位置,发起突然进攻。趁敌人慌乱之际,从敌人间隙成功突围。当敌人注意力被吸引到一排突围方向后,二、三排也向西南方向发起突围。就在这时,突然刮起了大风,卷起漫天黄沙,敌人视线不明,二、三排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突出包围,并成功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在胡堤湾和一排会合。随后,十一连越过黄河故道,在傍晚胜利与团主力会合。

此次阻击战,十一连共毙伤日伪军300多人,炸毁敌装甲车3辆,击毁敌汽车4辆,粉碎了日伪所谓夜间行动、多路合击的“新战术”,各路日伪军在湖西抗日军民的打击下损兵折将,不得不狼狈撤走,草草结束了“大扫荡”。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1933年8月5日,少共国际师在江西省博生县(今宁都县)跑马场正式成立,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第十五师。

少共国际师是一支真正由“红小鬼”组成的部队。成立之初,该师下辖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团,共1万余人,归红一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这个师在当时的红军中是一支最年轻的部队,战士平均年龄约18岁,很多只有十四五岁,很多战士“入伍时还没有枪高”,师政委萧华还不满18岁。全师党团员占70%,多数人入伍前就在反“围剿”斗争中配合红军打过仗。部队成立后,立即开赴广昌展开严格的军政训练,很快形成了战斗力。

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失败后不久,又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展开了第五次“围剿”。少共国际师提前结束训练,奉命开赴黎川前线,配合红三、红五军团在东方战线投入反“围剿”战斗。1933年9月3日少共国际师誓师出征,全师将士高唱《少共国际师》军歌,由江西广昌出发进入福建抗击敌人。9月26日该师进至邵武拿口镇时,遭到国民党新编第十一师周志群旅一个连的阻挠。

少共国际师进至拿口外围后,迅速分别包围了拿口守军和拿口下游3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1905年,沈缙云与无锡实业家周舜卿合资创办了上海信成商业储蓄银行。辛亥革命前,沈缙云资助于右任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宣传革命,并在于右任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此后,沈缙云积极参与同盟会在上海的行动,迎来往来人员、交际招待食宿等开支,基本由沈缙云主持的信成银行负担。不久,同盟会计划在长江流域一带组织武装起义,沈缙云受命筹款白银4.5万两,托人从国外购得步枪3000支、子弹50万发(这批枪支弹药从欧洲运经香港时,被查获全部没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上海同盟会和革命党人多次集会,准备响应武昌起义。其间,沈缙云任同盟会理财部干事,以银行为掩护,为筹划起义经费奔忙。11月21日,上海同盟会和革命党人多次集会,准备响应武昌起义。其间,沈缙云任同盟会理财部干事,以银行为掩护,为筹划起义经费奔忙。11月21日,上海同盟会和革命党人多次集会,准备响应武昌起义。其间,沈缙云任同盟会理财部干事,以银行为掩护,为筹划起义经费奔忙。

10月24日,陈其美、宋教仁、沈缙云等人在同盟会紧急会议上决定联络商团,沟通士绅,争取商团重要人物李平书加入起义,并指派沈缙云负责此项任务。沈与李号称莫逆之交,经沈前住动员,李表示愿意站到革命方面来。11月3日下午,上海同盟会发动起义,起义军在闸北一路进展顺利,而进攻江南制造局的一路遇到激烈抵抗。陈其美企图劝说清军放下武器,结果反被拘禁。在此危急关头,沈缙云、李平书等商议,决定以商团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1947年春,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关于恢复武装斗争的指示,在九连山、东江、潯江、五岭等地区,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北撤时留下的武装骨干为基础,先后建立14支人民武装,于1947年12月至1948年4月的战斗中,粉碎了国民党广东当局的第一期“清剿”。1948年8月,中共九连地区武装部队正式打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边支队的番号。

国民党广东当局在第一期“清剿”失败后,又发动了以东江南岸和九连地区为重点的第二期“清剿”。中共九连地委和粤赣边支队按照上级指示精神,迅速从各地区调集主力部队充实机动作战的主力团,并大力加强情报工作,对敌开展主动出击,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大湖地处连平县东南部,是通往九连山粤赣边支队司令部驻地河西的重要门户,国民党当局派一个加强连160多人防守此地。粤赣边支队领导考虑到大湖地势险要,国民党军防守严密,不易攻克,决定采取“诱敌入洞,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将敌人诱至距大湖10多里的狮子脑山进行围歼。战前,粤赣边支队派出精干人员,化装到敌军驻地周围进行侦察,了解国民党军的活动规律情况,绘制作战地图,并按照计划进行了多次演练,加紧准备一切必要的战斗工作。

11月14日晨,粤赣边支队派遣桂林队一个小分队到国民党军驻地,实施诱敌作战。小分队打响战斗后,

红军少共国际师初战告捷

吴小龙

公里处的南溪莲花山水上哨卡守军,并在拿口北坡构筑战壕。师长陈光、政委萧华居高临下观察守敌布防情况后,决定以一个营分兵东西迂回突破,以北面山坡设立主攻阵地,果断发起了对拿口敌人的全线进攻。

当时,由于物资短缺,少共国际师的指战员一般只发10发用旧弹壳改造的子弹。对此,陈光和萧华进行了充分研究后,根据部队的情况制定相应的作战方案。

战斗打响后,少共国际师的战士们先是一阵猛打,然后趁敌人慌乱之际,迅速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战斗中,战士们为克服身材、气力上的劣势,按照计划,两三个人对付一个敌人,让敌人顾此失彼。经过两小时激战,全歼敌军和大刀会成员百余人,取得拿口战斗的胜利,并打开了红军增援邵武的要道。

此后,少共国际师乘胜追击,渡过闽江再次击溃守敌200多人,还在南溪莲花山歼敌一个排,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军事器械和一座粮仓。战斗结束后,少共国际师将指挥部设在拿口的江西会馆,师部医院临时设在拿口的教堂,救治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军战士。驻拿口期间,红军指战员上街宣传红军政策纪律,并宣布伤员病员在得到老百姓许可方能借宿,其他一律沿街屋檐露宿。受到了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

沈缙云与上海光复

黄宗慈

为主力再攻制造局。商团集合千余人,临行前沈缙云即席痛哭陈词,闻者动容,士气高涨。当夜起义军围攻制造局,于次日黎明胜利攻克,上海全市光复。

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任都督,沈缙云任财政总长。因清政府所设各税捐局所原主事者已携款逃遁,起义部队粮饷没有着落,各地集中到上海的起义军多达数万人,巨额费用也需财政部筹措。沈缙云全身心投入筹款工作,很快通过关系为起义军各部筹集到白银30余万两。为了进一步稳定经济,沈缙云建议沪军都督府另组“中华银行”,建议获得采纳。11月21日,“中华银行”在上海成立,发行军用钞票及公债。不久,沈缙云接受陈其美委派,组织“南洋募饷队”,到南洋向华侨募捐(后来因故未成行,由庄希泉代理队长)。上海起义军参加攻打南京战斗后,为支援前线,沈缙云前住上海商团,为起义军“借用快枪500支”。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沈缙云为驻沪理财特派员,后又任命其为劝业特派员。4月,上海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织中华实业银行,孙中山任名誉董事,宋教仁等37人为筹备委员,沈缙云被推为筹备主任。由于沈缙云在辛亥革命中倾力献身革命,并为光复上海立下汗马功劳,孙中山特亲书“光复沪江之主动”匾额赠之。

粤赣边支队狮子脑设伏歼敌

尹向东

又派出当地“白皮红心”的保长向敌人报告“小股共军正在骚扰”的“情报”。与此同时,粤赣边支队几个主力连队秘密进入伏击地点——两个连埋伏于狮子脑主峰前的两个小山顶上,另两个连埋伏在左右两侧山地,担负迂回侧击任务。敌人果然中计,立刻倾巢出动,向小分队的侧近。小分队且战且走,佯装败退,沿途丢下水壶、鞋子、子弹等物。敌追我退,到了天黑,小分队和敌人对峙宿营。

15日上午8时,小分队主动发起战斗,再诱敌追赶三四里路,直至支队设伏地点。9时许,国民党军被全部诱入伏击圈内,暴露于狮子脑前开阔地带。粤赣边支队担任正面攻击的两个连立即集中火力,向敌人发起猛烈射击。敌人自恃装备精良,以多挺机枪向粤赣边支队主阵地还击,双方激战4个多小时,敌人始终无法突破正面阵地。

此时,担任两翼迂回的部队从敌人侧后发起袭击,将敌人包围起来。战士们迅速缩小包围圈,并发挥手榴弹的威力,在短距离给予敌人杀伤,又派神枪手瞄准敌人的机枪手射击。不一时,敌人机枪手被击毙数名,顿时火力大减。国民党军发觉情况不妙,企图组织突围,粤赣边支队指战员沉着应战,多次打退敌人的反扑。下午2时许,战斗结束,敌人除连长带领几人逃脱外全部就歼。

此次战斗共毙敌70多人,俘虏35人;缴获轻机枪5挺,长短枪50支,掷弹筒5具,子弹一批,取得了九连地区人民武装在第二期反“清剿”斗争中的首次歼灭敌军一个整连的胜利。